

张帆 著

北京人艺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张帆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说北京人艺/张帆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5306-3990-0

I. 话... II. 张... III. ①戏剧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②戏剧家—简介—北京 IV. I207.3

J89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203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50 千字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定价:25.00 元

《话说》前的话说

拿在您手上的这本书，实际上是个“拼盘儿”，是近两年本人所撰拙文的堆砌，没有文采，只能称作“话说”，而且说的也不怎么地道。人退休了，闲工夫自然多了起来，于是就凑了这么个“拼盘儿”。我不是专业作家，只是在业余时间，喜欢写点儿小玩艺儿，话题的范围也很窄，都没离开北京人艺，所以取书名为《话说北京人艺》。

凡正经八百的书，似乎都有序。以我本人的经历和所处的环境而言，请位名家给我写个序，并不费力，可我不想那么做。首先是咱不够作家的份儿，其次是书的质量也不高，学问实在有限，即便是请人写个序，也抬高不了自己，反而让人笑话。另外，我对现在文坛中相互吹捧的现象也厌恶之极。师生之间、朋友之间、夫妻之间，甚至一家子之间，都在相互吹，有什么意思呢？与其让人耻笑，不如自己白话几句算了。

说几句什么呢？

一、书名虽叫《话说北京人艺》，但我说的很不全面，很不深入，更谈不上系统。书中的文章大都是些杂感，想起什么就说什么，说的也不一定到位，但无论如何，都是我的心里话。北京人艺是一个了不起的剧院，“北京人艺”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我在北京人艺生活了三十五年，我深深地爱着这个剧院，爱她的过去，爱她的现在，也一定爱她的将来，我还会写《话说》之二、之三……

二、北京人艺是一个名家荟萃、“大腕儿”云集的剧院。我也知道看官们更想看这些内容，但我写的很少，尤其是年轻一点的，我写的就更少。道理很简单，这些名家、“大腕儿”

都是当今媒体追逐的对象，对他们的宣传报道用铺天盖地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尽管有些娱记的文章格调很低，但数量很惊人。既然话都被人家说了，我又何必再多劳呢？况且我这个人又不爱说言不由衷的话，还是少做费力不讨好的事吧。

三、书中所涉及的一些学术观点，纯属本人一孔之见，您尽可随时批判，不必客气。但有一点我要声明，我是北京人艺风格的忠诚捍卫者，我爱北京人艺，我不希望她走样儿。不走样儿并非不希望她的风格不发展，发展也并非一定要走样儿。

北京人艺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已完全“改朝换代”。如今我回到剧院，已增添了许多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剧院比我在的时候有了朝气，这是历史的必然。现在的文艺思想也愈发活跃，各种文艺思潮仍在不断地冲击着北京人艺，北京人艺要想坚持走自己的路，绝非易事，值得庆幸的是剧院还有一大批自己培养起来和我持相同观点的中坚力量，他们是剧院的栋梁，也是承前启后的希望。今后我也一定要用我微薄的力量支持他们，赞颂他们。

张帆

二〇〇四年七月三十日

于北京同仁园



目 录

CONTENTS

话说北京人艺	1
难忘的厚爱	24
我们的老市长	28
曹禺先生与北京人艺	35
北京人艺风格的奠基人——老舍先生	39
《雷雨》诞生之前	43
戏剧大师焦菊隐	50
欧阳山尊评传	59
重读起扬同志“散忆”有感	76
小议“北京人艺风格”	83
浅谈“北京人艺现象”	87
超出一般的完美追求	95
消逝的作家群	103
继承与“接轨”	107
院庆之际话传统	111
保住“神圣”	117
千万别忽视“软件”	121
时代的遗憾	125
话说人艺电视剧部	130
再说人艺电视剧部	134
《足球俱乐部》杂谈	142

一位令人难忘的大艺术家	149
“英大学问”	163
“老来火”的林连昆	172
不灭的神火	175
话说顾威	182
跨世纪的三位小“元老”	192
我替育生老哥吐心声	197
贵在追求	200
不可低估的忘却	204
也谈敬畏“经典”	209
好一个对“品格”的追求	216
北京人艺拒绝“小麦克”	224
傅维伯和他的小剧场	228
杜儿爷和他的老戏单	232
后记	236

话说北京人艺

上篇：一个国家级剧院的诞生

解放前，咱们国家没有专业话剧院，更谈不上有专供话剧演出的剧场。1952年6月12日，在周恩来总理和北京市委的关怀下，正式成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是著名剧作家曹禺。北京人艺刚建院时，条件相当艰苦，甭说固定的演出场所，就是像样儿的排练场也没有。那阵儿人艺排戏是在灯市东口的一座两层旧楼里，窗户临街，排起戏来常常要受到“当当车”（有轨电车）声的干扰，排着排着戏，只要“当当车”一响，导演就得叫“停”，否则导演就听不清演员的台词儿了。半天儿下来不知要停多少次，可戏无论如何还得接着往下排。您能想象的到吗，她起家的四个小戏《夫妻之间》、《赵小兰》、《喜事》和《麦收之前》是在今天的大华电影院演出的。后来的演出地点是北京剧场，也就是现在地处东华门的中国儿童剧场。而北京人艺坐堂演出的那个堂——首都剧场，是1956年建成的。建之前，那儿是一片破旧不堪的小平房，据说是解放初期改造妓女用的“生产教养院”。如今首都剧场已被载入“世界建筑史”，是世界知名的剧场之一。说起北京人艺的历史，似乎有个约定俗成的讲法，那便是一定要从“四巨头设计发展蓝图”的佳话谈起，我自然也不能破例。

“四巨头”者，何许人也？他们是：院长曹禺、副院长兼总导演焦菊隐、副院长兼副总导演欧阳山尊，以及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赵起扬。那么“四巨头”所设计的北京人艺发展蓝图又

是怎样的一幅图画呢？

老院长曹禺回忆道：“我们四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干过戏，都对莫斯科艺术剧院有一定的向往，都有对建设一个国家剧院的设想。我们在一起长谈了十来天，我们都希望办一个莫斯科艺术剧院式的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的中国自己的话剧院。是北京的而不是莫斯科的。要办好一个剧院首先是统一创作方法，要强调深入生活，要全面学习、借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要吸收民族艺术的表现手段。同时，我们还要把好剧本关和演出艺术质量关。北京人艺要的剧本是能够提高北京人艺的剧本，是对社会有好处的剧本。一个剧院要有自己的保留剧目，演一个，丢一个，这不是办剧院的方法。最后一点就是严格的规章制度，要讲艺德，讲绝对合作，讲‘一棵菜’精神，要有一个良好的院风。”

沿着“四巨头”的思路，剧院开张之初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全院人员倾巢出动，兵分四路深入工厂、农村体验生活，感染时代气息。在和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大家不但“滚了一身泥巴”，而且还交了许多知心朋友，同时排出了一组带着泥土芳香的小戏，这组小戏，就是在本文开篇时提到的在大华电影院上演的那四出起家戏。这组小戏连续演出55场，场场爆满，轰动京华。从此，深入生活就成了北京人艺的“传家宝”。

接下来就是焦菊隐先生排的老舍的《龙须沟》。老舍先生的这个本子人物性格突出，语言生动，京味甚浓。焦先生在排这个戏的时候，要求全体演职人员统统下到北京南城的龙须沟去实地体验生活，要求每个演员都要记笔记，写角色“自传”。他告诉演员“要想创造人物形象，必须先有心象”，要在检验角色内心感情的同时，注意观察人物的外在特点。他要求演员

在舞台上创造出活生生的人。此外，焦先生对群众场面和舞美各部门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一丝不苟，要有“一棵菜”精神，演出必须有整体感。

《龙须沟》的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时至今日，还是老幼皆知，有口皆碑。然而《龙》剧的成功固然重要，更为重要的是《龙》剧的排练为北京人艺打下了坚实的现实主义基础。后来《龙》剧的经验发展成这样三句话：“深厚的生活基础，深刻的内心体验，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三句看似普通的话，在北京人艺心中是有分量的，直到今天，它还是大家的追求。

沿着“四巨头”的思路。1954年，蓝天野等一批年轻的艺术家的被派到中央戏剧学院接受来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故乡的苏联专家的训练和培养，系统地学习斯坦尼体系的真谛。与此同时，剧院又把苏联专家库里涅夫请进剧院讲学并担任《布雷乔夫》的艺术指导。这一举措，在统一创作方法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然，在创作方法上不光有斯坦尼，还有布莱希特、还有梅兰芳。作为一个致力于创世界水平、创中国特色、创自己独特风格的剧院，还必须多方面地吸收我们民族自己的艺术精华。因此许多戏曲界、曲艺界的名流，像荀慧生、赵荣琛、裘盛戎、良小楼、侯宝林、魏喜奎等艺术大师都先后来剧院讲课，传授姊妹艺术的表现手段。同时，剧院还鼓励大家学习歌舞拳剑、琴棋书画，鼓励多才多艺，一专多能。今天享誉剧坛的于是之的书法、梅阡和蓝天野的国画、朱旭的胡琴等都是他们早年勤学苦练的回报。

边学习、边实践、边统一、边创新，这是剧院早期的成功之路。继焦先生的《龙须沟》之后，“四大导”中的另外三大导演，也陆续推出了各自的好作品，如欧阳山尊的《仙笛》和

《日出》，夏淳的《雷雨》和《风雪夜归人》，以及梅阡的《骆驼祥子》。

1956年，首都剧场建成了，欧阳山尊导演的《日出》第一个被搬上了北京人艺自己的舞台，从此剧院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大至整个世界，小至一个人，人们在谈论他们的历史的时候，常常喜欢用“里程碑”这个字眼儿。焦先生导演的《虎符》可称得上是北京人艺历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因为《虎符》的排演是焦先生把我国民族戏曲的表现手法及其精神，有意识地运用到话剧中的尝试，也是焦先生在探索话剧民族化上的一个新起点，一个新的里程碑。在对《虎符》的处理上，他首先突破了话剧传统的镜框式舞台，突破了舞台时空的局限，第一次采用黑丝绒幕为整个舞台的背景，舞台上也只有几件极有代表性的道具。这样的探索在今天看来可能算不得什么，但在当时，要打破已经有了40多年历史的传统话剧舞台，那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他还把戏曲的锣鼓经、京剧的“道白”及“水袖”运用到排练中，为此，他要求演员花大力气学习研究传统戏曲，要一招一式、一字一句地虚心向戏曲老师学习。他说：“我们要有中国的导演学派、表演学派，使话剧更完美地表现我们民族的感情，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经过半年多的探索、排练，《虎符》于1957年春节前夕在首都剧场首演，并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这以后到建国十周年的前夕，焦先生陆续导演了《茶馆》、《智取威虎山》、《关汉卿》、《蔡文姬》和《三块钱国币》。其中《茶》剧和《蔡》剧成了北京人艺的传世佳作。

与此同时，欧阳山尊导演了《带枪的人》、《烈火红心》，夏淳导演了《名优之死》、《红大院》和《悭吝人》，梅阡导演

了《女店员》，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陈颙导演了巴西名剧《伊索》。这几位导演所推出的力作虽然风格特点不同，但他们遵循的创作方法是一致的，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他们的作品带给观众的韵味是共同的，是北京人艺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殊途同归。

随着一批佳作的诞生，一批有才华的演员也随之名噪京城，他们当中有舒绣文、刁光覃、田冲、叶子、朱琳、于是之、方瑄德、胡宗温、赵蕴如、童超、苏民、郑榕、蓝天野、董行佶等。

有郭沫若、老舍、曹禺和田汉这几位文学巨匠的不朽剧作，有焦菊隐这样锐意创新的艺术大师，有若干台代表着民族话剧希望的好戏，又有一大批崭露头角的优秀演员，北京人艺长大了，北京人艺成熟了，北京人艺的风格初步形成了。

1959年10月，当举国欢庆建国十周年的时候，北京人艺一举推出了《蔡文姬》、《骆驼祥子》、《雷雨》、《日出》、《带枪的人》、《烈火红心》、《怪吝人》和《伊索》等八台大戏献礼，这在当时京城的舞台上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

十年大庆刚过，节日礼花的硝烟似乎尚未散尽，我们的国家便遭遇到不可抗拒的天灾与人祸，陷入了三年困难时期。这三年之中，北京人艺的同志们和全国人民一样，没有消沉，没有退却，而是迎着困难，艰苦奋斗，继续在探索创新的路上勇往直前。他们先后排了《枯木逢春》、《三姐妹》、《同志，你走错了路！》、《胆剑篇》、《武则天》、《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和《红色宣传员》等近二十台大戏。其中，《同》剧、《武》剧和《智》剧最受观众欢迎。

北京人艺走红了！这在当时北京可是不简单哪！北京是全国话剧院团最集中的地方，除北京人艺外，还有中国青年艺术

剧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和中央实验话剧院。部队系统有总政话剧团、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空政话剧团、海政话剧团。产业方面军有全国总工会话剧团、煤矿话剧团和铁路话剧团。就力量而言，哪个团也不弱，尤其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中央实验话剧院，几乎与北京人艺成三足鼎立之势。在这种群雄争冠的局面中，北京人艺独辟蹊径，率先自成一家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么，北京人艺是否能得到全国话剧观众的认可呢？尤其是上海观众。因为文艺界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起，就有“上海码头不好闯”的说法，言外之意上海的观众最挑剔、最难伺候。为了打破这一神话，也为了证实一下自己的实力，1961年冬北京人艺带着《蔡文姬》、《伊索》、《同志，你走错了路》、《胆剑篇》、《名优之死》等五台大戏南下直奔上海滩，并且一炮打响，轰动华东。北京人艺的演出被称赞为“示范性”的演出，是“中国话剧的典范”。这样的殊荣，不是谁都可以享誉的，这说明北京诞生了一个国家级的艺术殿堂，她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雏鹰长出了坚硬的翅膀，她要高高地飞翔，可是“极左”的旋风却愈刮愈狂。上海之行以后，北京人艺几乎拿不出什么好作品来，值得一提的戏，也不过有《李国瑞》、《矿山兄弟》等两三个戏，而且它们同样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人艺和全国其它的话剧团体一样，没有声音了，江青宣布了她们的“死亡”。

中篇：辉煌的年代

1976年10月，春雷一声，北京人艺被封闭了十年的大门打开了！艺术家们被禁锢了十年的创作欲望和报国心愿，犹如火山爆发，喷薄而出。北京人艺又重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四人帮”垮台后，剧院在移植了《万水千山》、《针锋相对》等戏之后，发现了青年作家苏叔阳的处女作《丹心谱》。于是立即组织力量加工修改，并很快将其搬上舞台。《丹》剧以其巨大的现实主义魅力和深厚浓重的真情，震撼了首都观众。不久，将迈入古稀之年的老院长曹禺，老当益壮，一举撰就他在“文革”前未能完成的交响曲——《王昭君》。这两部戏的演出，给禁锢了十年之久的北京话剧舞台吹来了一股清馨的风。北京人艺的传统、北京人艺的风格在这两个戏里得到重现。它们的上演，不但唤醒了北京人艺的老观众，也引来了许多新观众。北京人艺的领导者们此时意识到，全面恢复北京人艺传统、北京人艺风格的时机到了，培养一代新人的时机成熟了。于是剧院以老中青三结合的阵容，接连整理重排了《蔡文姬》、《女店员》、《茶馆》、《三块钱国币》、《名优之死》、《雷雨》、《伊索》、《骆驼祥子》、《怪吝人》等保留剧目。这些剧目的演出不仅使人艺恢复了青春，而且锻炼了中青年演员。老艺术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中青年演员“开了窍”、“入了槽”。广大观众看了这些重排的保留剧目之后，为之耳目一新，深有重睹芳华且又胜似当年之感。今天，翻回来再看当年这个决策，应该说是十分英明的，它为北京人艺后来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保留剧目的恢复演出不但吸引了观众，更像磁石一样引来了许多院外的作家，他们为北京人艺带来了一部部佳作：《为了幸福，干杯！》（水运宪编剧）、《故都春晓》（绍武、会林编剧）、《左邻右舍》（苏叔阳编剧）和《祸起萧墙》（水运宪编剧）。与此同时，剧院的作家和艺术家们也先后推出了《老师啊，老师！》（李婉芬、朱琳编剧）、《咸亨酒店》（梅阡编导）、《谁是强者》（梁秉堃编剧）、《吉庆有余》（王志

安编剧)和《不尽长江》(顾威编剧)五台大戏。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短短五年中,北京人艺竟上演了27台戏!它像闪光的“国宝”,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1980年,焦先生的代表作《茶馆》出国了!它开创了中国话剧走出国门的历史,它以极强的艺术魅力征服了欧洲的观众,它在西欧的15个城市演出25场,场场轰动。西方的评论家们惊叹这是“东方舞台的奇迹”、“世界艺术的精品”。焦先生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但他所追求的创造具有中国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中国话剧的目标实现了。从此,北京人艺的国际、地区交往日益频繁:

1980年8月,《王昭君》赴香港演出;

1981年3月,英国著名导演托比·罗伯森,来北京人艺执导莎翁名剧《请君入瓮》;

1983年3月,美国著名导演阿瑟·米勒来北京人艺执导他自己的名剧《推销员之死》;

同年9月,《茶馆》出访日本;

1985年2月,《推销员之死》赴香港演出;

1986年,《茶馆》出访香港,加拿大和新加坡,《推销员之死》也随之出访新加坡;

1988年10月,美国著名表演艺术家查尔斯·赫斯顿来北京人艺执导当代名剧《哗变》;

1990年11月,《天下第一楼》又出访了日本;

1991年,原苏联莫斯科艺术剧院总导演奥列格·叶弗列莫夫来北京人艺执导契柯夫名剧《海鸥》。同年11月《天下第一楼》又出访香港;

截止到1992年建院40周年,北京人艺的四台大戏,先后九次出访,足迹所到,反响强烈,盛况空前。

除上述交流外，这期间剧院自己的导演也排了许多外国戏。如夏淳导演的《女人的一生》、《车库》和《洋麻将》，田冲导演的《屠夫》，蓝天野导演的《贵妇还乡》，方琯德导演的《公正舆论》和《流浪艺人》，英若诚、林兆华导演的《上帝的宠儿》，林兆华导演的《二次大战中的帅克》和《纵火犯》，任鸣导演的《回归》。

无论是出访演出还是国内演出，它的基础还是创作上的大丰收。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北京人艺先后创作演出了近50台戏，几乎年年有优秀的新剧目推出。这其中除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几部戏外，还有《绝对信号》、《好运大厦》、《红白喜事》、《女儿行》、《阵痛的时刻》、《小井胡同》、《野人》、《狗儿爷涅槃》、《天下第一楼》、《末班车上黄昏恋》和《李白》等。其中《绝对信号》、《红白喜事》、《小井胡同》、《狗儿爷涅槃》、《天下第一楼》反应尤佳。

在这辉煌的十年中，应当特别提及的是北京人艺1988年11月的第二次上海之行。80年代中后期，通俗文艺和流行歌曲几乎占领了整个文艺市场，包括话剧在内的许多严肃艺术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滑向了低谷，而此时的北京人艺仍显出勃勃生机。上海《文汇报》和上海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似乎悟出了其中的奥妙，他们为在推动话剧走出低谷上贡献一点力量，于是千方百计地邀请北京人艺第二次访沪。努力成功了，北京人艺还是带着五台大戏：《茶馆》、《天下第一楼》、《狗儿爷涅槃》、《哗变》和《推销员之死》。来到了阔别27年的大上海作汇报演出。18天里，演出21场，场场爆满，4万张戏票在演出团到达之前即预售一空，上海各报竞相报道多年不见的“五台好戏，万人空巷”的盛况。由于北京人艺的到来，上海掀起了一股不小的“话剧热”。时隔27年，上海的观众又看到

了一个全新的北京人艺、一个生机勃勃的北京人艺。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不但看了全部的演出，还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与南北戏剧家们共商繁荣话剧问题。

北京人艺的这次上海之行不仅轰动了上海，而且声扬全国，为此她受到了文化部和北京市委的嘉奖。在此形势下，北京人艺迎来了她不惑之年的生日。

为庆贺这个辉煌的节日，《光明日报》在头版的显赫位置刊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写的题为《构筑国家级艺术殿堂的成功之路》的文章，文章以无可争辩的论述，向全国亿万读者宣告：北京人艺——一个国家级的剧院已构筑在中国的大地上。

为庆祝这个辉煌的节日，北京人艺隆重推出了《舞台上的真故事》、《李白》、《红白喜事》、《雷雨》、《推销员之死》、《狗儿爷涅槃》、《天下第一楼》和《茶馆》等八台大戏以示纪念。

为了庆贺这个辉煌的节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北京人艺联合召开了“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国际学术讨论会”。

为了庆贺这个辉煌的节日，剧院为 93 位曾与她共同度过了 40 个春秋的老同志、老艺术家，颁发了“元老杯”。

为了庆贺这个辉煌的节日，在庆典的前一天，江泽民总书记亲临剧院，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家表示祝贺并预祝剧院今后取得更大成就。

十年辉煌，十年艰辛。这期间北京人艺领导者们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在编、导、演、舞美这支撑剧院的四大支柱上。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功夫首先要下在剧本上。要有好剧本。先有好作家。剧院创作的大门是一直敞开着的。早年，剧院只有梁秉堃，蓝荫海和王志安三位作家，1983 年以后，几位年富力强又具有相当实力的作家先后踏进了北京人艺的大